

■ SARS 时疫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

信息公开、社会基础与社会心理

罗 教 讲

自 2002 年底 SARS 在我国广东首次发现后,由于种种原因,其蔓延态势日越严重。直到 2003 年 4 月 20 日,中国政府才终于制订并向全世界宣布了一系列后来被证明行之有效的 SARS 防治方法,包括信息公开、对感染区进行隔离以及对不负责任的官员进行惩罚等一系列措施。SARS 信息公开化以及相应的防治措施,为缓和公众的恐惧情绪、增强人们战胜 SARS 的决心,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但是,一系列由于 SARS 引起的群体恐慌事件,同样发生在 4 月 20 日以后,包括北京大学生的擅自离校回家、民工逃离北京,特别是传播范围跨越 14 个省区的特大流言事件。本文仅对此进行分析和探索。

1、社会心理及其影响因素

公众对 SARS 所表现出的恐慌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心理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它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是一种不系统、不定型的、自发的反映形式。社会心理表现为感情、风俗、习惯、成见、自发的倾向和信念等等。”社会心理具有如下特点:(1)非理性特点。“非理性就是指人的直觉、意志、欲望、本能、灵感等,它不以科学为前提,也不尊重逻辑。”我们说社会心理具有非理性特点,是指社会心理作为人们对现实情境的反应方式,通常不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逻辑性,而往往是一种直觉、习惯性乃至本能式的反射活动。(2)民族性特点。社会心理的民族性特点,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底蕴会给该民族的社会心理打上印迹。处在同一时代,面对同一情境的不同民族,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表明社会心理具有民族性特点。(3)时代性特点。时代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不是时间本身,而是发生在该时间内的社会事实和社会情境。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决定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活动内容和表现形式。

社会心理,作为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社会基础的影响。我们把社会基础分为整体的社会基础和个体的社会基础。整体社会基础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社会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 4 个方面。个体的社会基础则指社会中的个人所具备的社会条件与社会特质,我们用个体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民族心理特质和价值观念等 4 项指标来测量个体的社会基础。个体社会基础是整体社会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个体社会基础的集合构成整体社会基础。其次是信息的影响。一般而言,在一个信息闭塞的社会中,形成的是封闭的社会心理;而在一个开放的信息社会里,则能形成开放、豁达的社会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当社会处于非常状态时,如遇到突发性危机事件时,信息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显得至关重要。再次是突发事件的影响。社会中的突发事件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因素,如战争、地震、传染病流行等自然灾害以及爆发性的社会运动等都属于突发事件。突发事件之所以会给社会心理造成影响,是因为突发事件通常会给社会成员造成威胁和伤害,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会做出应急反应,从而导致原有社会心理的改变、扭曲甚至变态,恐慌就是一种典型的被扭曲的社会心理。可见,在个体社会基础和一定的信息状况下,突发事件 SARS 会对中国社会心理产生影响。

2、SARS 危机中的中国社会心理解读

正当全国人民由于政府采取了信息公开化的举措、恐慌情绪日趋缓和之际,却接连发生了出乎意料

的事情。一是大量在校大学生和外地民工逃离北京,二是一个“婴儿初生就说话,放鞭炮驱非典”的流言和谣言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中国的14个省,并在几天内达到高潮。

社会心理的分析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面对SARS突发性事件,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因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基础。不同的社会基础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在面对SARS这样同一个突发事件时,对信息具有不同的社会认知水平,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态度和恐慌情绪,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特别的社会群体,因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具有特殊性。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大学生,在家庭中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是靠父母精心呵护着成长起来的,而且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他们接受的都是一种培养听话的好孩子、好学生的说教和应试教育。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最缺乏的是独立意识和能力。政府4月20日采取SARS信息公开化以后,大学生们产生了更大的恐慌,这表明他们没有具备对所面对的局势和信息进行独立分析、做出正确判断从而进行决策的能力。在当时的北京,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安全,还是出于他人(包括家人)安全的考虑,其最佳的选择都是留在北京,而不是逃离北京返回家乡。可以说,大学生们逃离北京完全是一种由于恐慌引起的非理性行为。

城市中的农民工是一个特别的社会群体。虽然他们身在城市,有的已在城市生活工作多年,但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民族心理、价值观念都与城市居民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城市中特殊的弱势群体。城市民工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社会基础,决定了他们在接受同样的SARS信息时,形成与城市居民迥异的社会认知、社会态度和恐慌情绪反应,并在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下产生逃离北京的非理性行为。

跨越14省的流言与谣言的起源和传播区域大都是农村地区。显而易见,类似的流言和谣言通常不会在当今的中国城市产生和传播。只有在农村和农民这个社会群体中才存在产生和传播此种流言和谣言的社会基础。从这里我们看到,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20多年,而且改革开放首先发端于中国农村,今日中国农村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农民群体的社会基础而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因此,当农民与城市居民接受到同样的SARS公开信息后,产生的是与城市人完全相反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

3、结论与思考

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中,人们面对同样的事件、接受相同的信息时,会产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社会心理,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基础。从此出发,我们不仅能够通过一个社会的整体社会基础来测量并预测特定社会条件下国民的整体社会心理状态和水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和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基础,来解读他们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心理倾向和行为表现。反过来说则是,通过特定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心理表现,能更清楚、准确地了解他们所具有的社会基础状况,从而为改进我们的整体社会基础找到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通过以上对SARS社会心理反应的分析,有三大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其一,中国的教育应该如何改革,才能在改进受教育者的个体社会基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提高我们民族的整体社会基础。其二,要提高整体社会基础的水平,应该在增强弱势群体,特别是在增强人数众多的中国农民群体的社会基础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因为弱势群体薄弱的社会基础,会严重地影响到我国整体社会基础水平的提高。其三,信息公开是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应有的内容和运作模式。但是,在一个整体社会基础水平不高,特别是各社会群体的社会基础水平参差不齐的社会中,信息公开化应该是有条件的。而且从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技巧的角度来看,应该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基础水平,采用不同的信息公开化途径与方法才是最佳的选择。

(作者:罗教讲,武汉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何良昊)